

# 惊天事业 沉默的人生

## ——追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院士



那个习惯锁眉头思考问题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因病辞世,享年93岁。

“55年前,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后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接触到他,从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合作,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笔者,非宁静无以致远,是于敏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我安慰了。”生前于敏曾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 为国家需要转身

1961年1月,于敏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在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

### 人物春秋

过年从正月初一拉开序幕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结束,这段时间关中地区每天都有喜庆的活动,总而言之是以喜庆、团圆、祝福和迎新为主要内容,以各种形式来渲染喜庆的气氛,起到锦上添花、锦上添花的效果。除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互相拜年、祭祖这些小型活动外,陕西各地还有大型灯会、社火表演、民间鼓舞、戏曲表演等有声有色的习俗活动,其中社火表演阵容庞大、气势宏伟,震撼人心。

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身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于敏的名字“隐形”长达28年。惊天事业,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在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中,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他趴在桌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在此之前的1966年12月28日进行的氢弹原理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

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 审时度势预则立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笔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笔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重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昭唐老人

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于敏对此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陈瑜



在研究室讨论工作 一九八九年四月 于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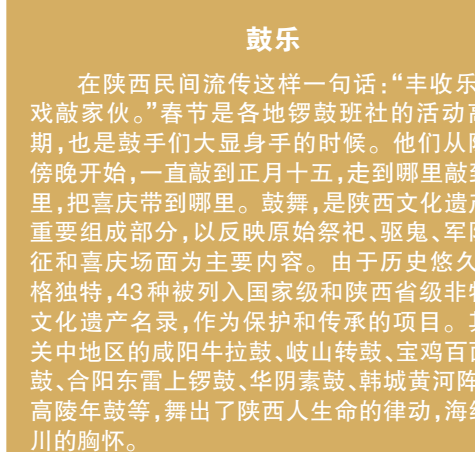
# 生龙活虎的关中社火



高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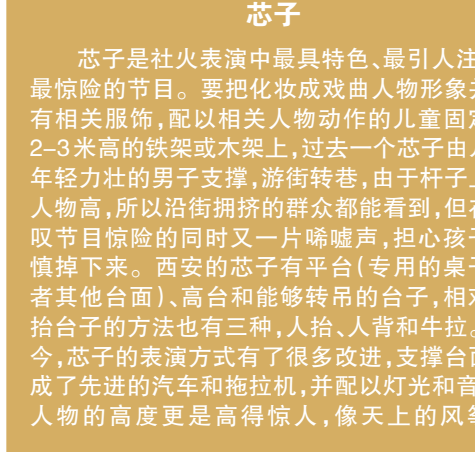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秧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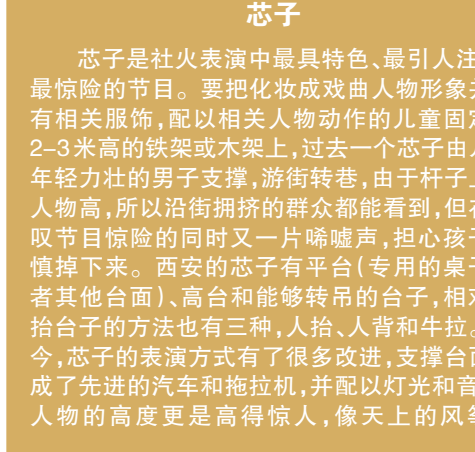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踩木棍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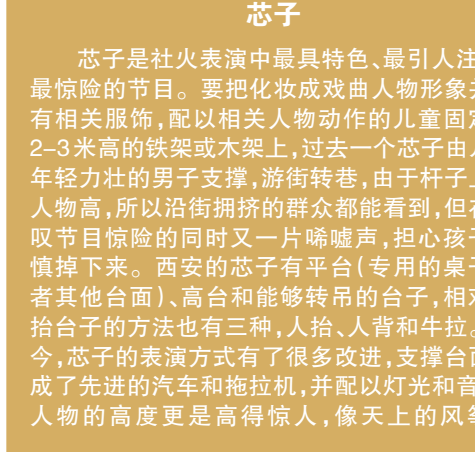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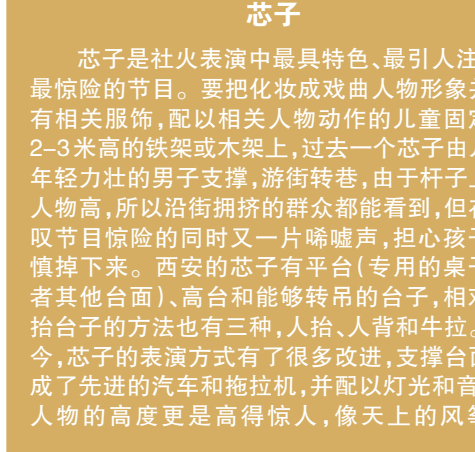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舞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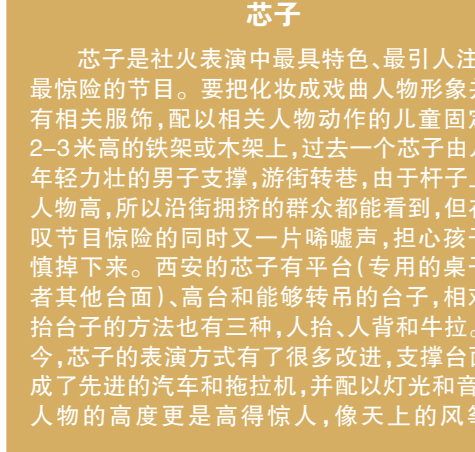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秧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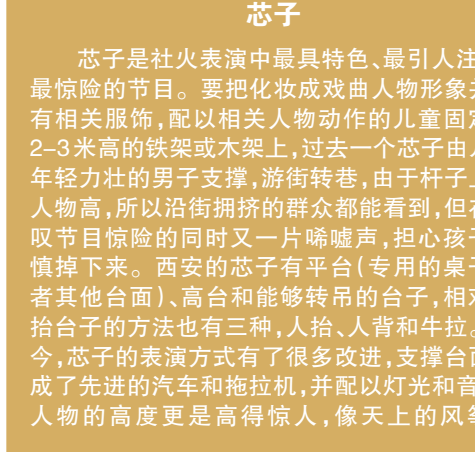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秧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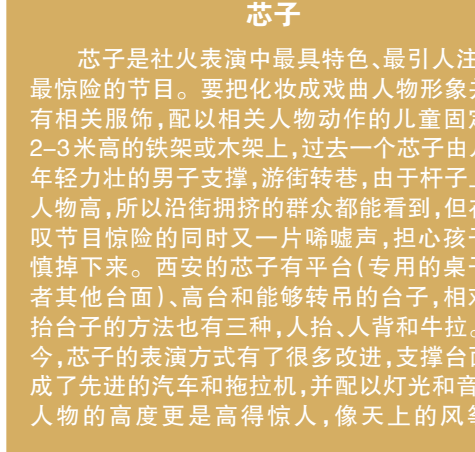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秧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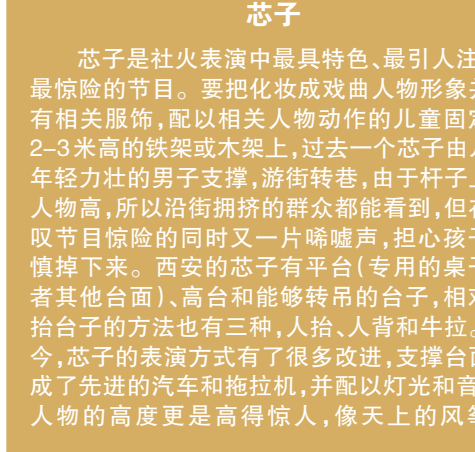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秧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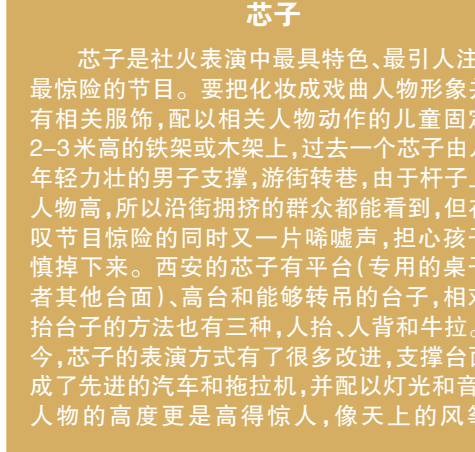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秧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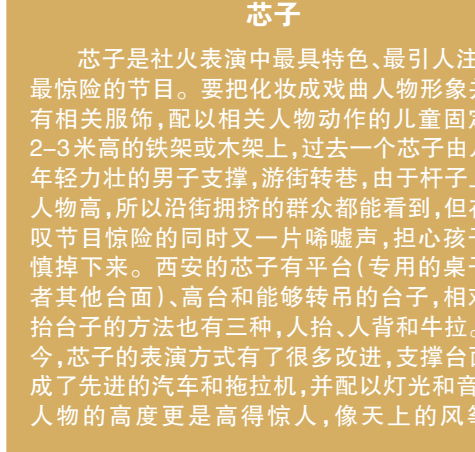
秧歌舞



秧歌舞



秧歌舞



秧歌舞

马者多和战斗有关,所以竹马表演的多是武戏。竹马表演也是一个团队,一般有6组,每组2人表演,表演的有英俊的小生,也有幽默诙谐的丑角,红男绿女皆因剧情安排。《三英战吕布》《长坂坡》是表演最多的武戏,演出时竹马叮当、鼓声震天,武士鞭鞭挥马、生龙活虎。

### 旱船

旱船同竹马一样也是一种民间舞蹈,只不过把马换成了船。船是由竹子和木棍扎成,用彩绸、纸花装扮成色彩艳丽、形式华美的舟船道具,演员把彩船套在腰间表演一定情节的节目。由于演员表演时,跑着碎步旋转,犹如一叶扁舟在水中游动漂浮一样,所以命名为“跑旱船”。旱船表演人数少,多为渔夫和渔女两人表演,他们模拟水中行船的情况时而顺流、时而逆流、时而触礁、时而搁浅、时而推船、时而挖沙、时而拉船,在欢快热烈的打击乐中,二人单唱或对唱民歌小调等民间曲艺,最终乘风破浪满载而归,以欢快收场。

### 秧歌舞

秧歌舞,又称扭秧歌,也是一种民间广场中独具一格的集体歌舞艺术。秧歌舞独具特色,一般由十多人至上百人组成,人们扮成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边走边舞,随着鼓声节奏,变换各种队形,再加上舞姿丰富多彩,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扭秧歌,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记述:每年春耕时,农家的妇女儿童数十计,一起到田里插秧,一人敲起了大鼓,鼓声一响,“群歌竞作,弥日不绝”,称之为“秧歌”。它最早是以唱歌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成舞蹈和戏剧表演的形式,并流行于我国南北各地,逐步演变成灯会、年节中必不可少的表演。

人们喜闻乐见的春节社火活动,如今已经从民间乐事、民俗民风发展成为民间特色文艺走出陕西,走入国际。国家及地方每逢庆典活动、重大比赛、礼仪剪彩等场合都有社火表演来烘托喜庆气氛。关中各项民间社火也因其奇特的表演艺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崔彦

### 往事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者在编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在许多人的成长道路上,都曾受益于一本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有些人把这本书叫作“无声老师”“智慧的扁舟”。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本厚厚的词典已经走过一个“甲子”,在60年岁月里记录着我们的时代,积攒下一份“语言的史料”。

### 忠实反映时代语言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为完成这一任务,原隶属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的编纂机构)、原隶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的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建了40人的词典编辑室,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1958年夏,《现代汉语词典》开编。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重要工具,语汇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由词典总结。一部好的词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编词典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好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

1961年3月,丁声树先生接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丁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语法学、文字学、词典编纂等方面造诣颇深,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评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人选”。丁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1965年试用本出炉。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主持人单耀海先生回忆,丁声树先生曾说过: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经过普遍调查,尊重语言实际,大家都这么说,词典就得承认它。许多词条的背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为阴平 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与此相反,对那些存在歧义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先生主编的试印本只列 fān 一个音,“吐蕃”注为 tǔfā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蕃”的应用实际,增加了 fān 音,“吐蕃”改注为 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一谈 tǔbō。丁先生说“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这一读音做了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从收录一代语词、反映语言面貌来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前无古人的。

### 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力”

《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分送有关方面审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这时,“文革”开始了,编辑工作停滞,直到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历经1960年试印本、1965年试用本、1973年内部发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



# 现代汉语词典 一本书的「甲子往事」

吕叔湘先生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

丁声树先生说过:“我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的,让读者在最节省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1967年,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在北京单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后来,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来,犹历历在目,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令人唏嘘。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学问,叫《现代汉语学》。

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现代汉语词典》不能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同时,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另外,商务印书馆研发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App 即将面世。在国际传播方面,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吉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希望《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 □杜翔

左图 1958年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编辑的工作人员合影。下图 60多年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全家福”。左下图 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出的《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